

「補白大王」鄭逸梅

「讀人閱史」之九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，著作等身，在文壇筆耕八十年，發表了近兩千餘萬字的文稿。到了九十八歲臨終之際，還寫了七千字的長文〈畫家潘天壽〉。他就是被稱為「補白大王」的鄭逸梅。

鄭逸梅（1895-1992），本姓鞠，名願宗（學名際雲），號逸梅，別署「紙帳銅瓶室主」。名畫家吳湖帆曾繪了《紙帳銅瓶室圖》贈給他，他懸掛在他的書室內作為標識。他有時也署「拙鳩」，又署「大迂居士」，因這「迂」字，他就自諡「文迂」，請人刻了一方印章「鄭文迂公」，常鈐用在信箋上。他說：「在封建時代，諡法看得十分隆重，凡高官顯爵，死後由朝廷賜他一個諡法，如文正、文忠、文襄、文恪等類；生前如果沒有祿位，而在鄉里卻有些資望，則也可由門生故舊給以諡法，這名私諡。無論是公諡或是私諡，都是死後才有，我迂拙成性，這個『迂』字是確切不過的，至於『文』字，我塗抹一生，這『文』字可說也有了著落，因之『鄭文迂公』稱號也就當之無愧的了，我認為與其死後方得，何不生前先用？」。

他是江蘇吳縣（今蘇州市）人，出生於上海江灣。父鞠震福，營米業，母鄭瑞娥。四歲時，父親去世，依靠外祖父鄭錦庭為生，由於外祖父的兒子國齡早亡，因此把他在名義上作為國齡的嗣子，改姓鄭，自此改稱外祖父為祖父，由祖父啟蒙，教以認字，並講述《三國演義》給他聽。稍長入讀私塾，隨顧師慰若讀書，從小愛書如命。1905年，入「上海五金公所」開設之敦仁學堂，學堂介於私塾與學校之間，採取新式教育方法。他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，屢次受到嘉獎。1909年，鄭逸梅隨祖父來到蘇州，考入蘇州草橋頭長（洲）元（和）吳（縣）公立高等學堂。同窗中，有顧頡剛、吳湖帆、葉聖陶、王伯祥、范煙橋、江小鶴、江紅蕉、龐京周等，皆一時俊彥，頗得切磋之益。而當時商務印書館創刊的《小說月報》，成為他閱讀文藝雜誌的開始。

民國元年，他考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中學，中學二年級時首次署名逸梅，將英文課本中之一篇遊記譯成中文，取名〈克靈湖遊記〉，參加《民權報》副刊徵文，獲甲等獎，編輯吳恤還來信嘉獎，說：「如此文章，多多益善。」，受到這樣的鼓勵後，鄭逸梅信心大作，於是開始走上了畢生的寫作道路。《民權報》後因反對袁世凱，被封禁後，改辦雜誌《民權素》，月出一期，鄭逸梅繼續寫稿，闢有專欄《慧心集》每期連載，這是他為雜誌寫稿的開始。同時，



鄭逸梅又為《小說叢報》、《小說新報》寫稿。其後不久，上海的報刊風起雲湧，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、《時報》為滬地報刊三鼎足。這三家報紙的副刊，鄭逸梅都任特約撰述，長期為之寫稿。另外，還為《上海繁華報》、《笑畫》、《最小報》、《心聲》半月刊、《快活》旬刊、《星光》雜誌、《紅雜誌》等刊物寫稿。鄭逸梅說：「這樣月計有數萬言……。我寫的文章往往是很短的，多則數百言，少則十數字……。這樣的文章，與那些鴻篇鉅著自是不同，但它小巧、玲瓏，鑲嵌於其他長文的尾末，『補』了版面的『白』，久而久之，人們就名之為『補白體』，而鄙人姓鄭，於是，『鄭補白』之名就不脛而走了。」其後徐卓呆（傅霖）稱之為「補白大王」，因此有「無白不鄭補」之概。《小說叢報》創辦人之一劉鐵冷回憶說：「任何雜誌之分類文字，可以延專家撰述，唯補白一項，雖附屬各篇之後，然文筆非精峭，趣味非雋永，不合補白之用。當年《叢報》中，補白精且多者，首推我友鄭逸梅，彼讀書既多，筆亦短小精悍，此『補白大王』封號之所由上也。」可見「補白大王」之稱謂，並非隨便可以當之，它不僅量要多，而且質還要精彩，兩項都要具備。

鄭逸梅在〈我的自述〉中說：「從草橋學舍畢業後，我經同學袁丕烈的介紹，設館於其族袁寬夫家，教寬夫子女讀書。這是我為人師表的起點。數年後（案：1919年），辭袁家教館就教於蘇州閶門外楊家濱馬氏館。後來馬氏親戚郁氏辦惠有學校，聘我主持教務。此後，雖然更換了不少學校，但我一直執著教鞭。」

1920年冬，鄭逸梅與范君博、趙眠雲（復初）編輯蘇州《遊戲新報》，僅出一期。1921年5月，與趙眠雲任《消閒月刊》編輯主任；同年翻譯《福爾摩斯探案》。1922年8月，與趙眠雲、范君博、姚蘇鳳、范煙橋（鏞）、顧明道、孫紀于、屠守拙、范菊高等八位蘇州作家於「留園」茶話，發起成立「星社」。「星社」後來雖維持十五年之久，但其盛況只在前四、五年間，顧明道在1933年8月為范煙橋的小品集《茶煙歌》所作的序文中，就慨嘆說：「然而時異勢遷，人事無常，其後諸子相率走海上，或教育、或電影、或經商、或入政門、或輯報、或執律，留居吳下者寥寥焉。洎乎今日，歲時集會亦不易覲，有昔日之盛，乃有今日之衰，回首當年閒情逸致，嘯傲園林之樂，誠不禁感慨繫之矣。」

鄭逸梅說：「1926年，我的第一種單行本著作《梅瓣》（案：當為《梅瓣集》）問世，由孫玉聲開辦於福州路的上海圖書館出版。之後若干年來，曾為數十種報紙、雜誌寫稿，如《上海繁華報》、《明報》、《太平洋畫報》、《新新日報》、《新上海》、《紫羅蘭》、《新月》、《鍼報》、《世界小報》等等。又擔任《金鋼鑽報》、《華光半月刊》等的編輯工作。在寫作之外，我當時還翻譯過英國柯南道爾名著《福爾摩斯探案》多則，由世界書局出版；也曾編過電影劇本五種，如《國色天香》、《三生石》、《萬丈魔》等等，均拍成電影上映。在三四十年代，我以教書為主，除擔任多所高等院校文學教授外，又兼任國華中學校長，以及一些中學課程，寫作略為減少，但仍在十數家報刊長期撰稿，如《上海報》、《新上海月刊》、

《珊瑚半月刊》、《萬象》、《樂觀》、《大上海》、《大眾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古今》、《快活林》、《鐵報》、《小報》、《力報》、《新上海》等等，又編輯《明星日報》、《永安月刊》，到1949年，我除了為數十家報刊寫稿外，當時日盡三五千言，不足為奇，常在燈下寫到深夜，另外還得批閱學生課卷，十分辛苦，後來則另請外面代課教師專門批改卷子。我在1949年以前共出版單行本著作二十二種，發表於報刊的散稿則不計其數，估計有五百萬言以上。」

鄭逸梅又說：「1980年以後，各地出版社又紛紛前來約稿，我已八旬老翁，乃再重操寫作，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，次年，我出版了五十四萬言的《南社叢談》，這是我在『文革』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。接著，每年平均出版單行本作品二至三種，截至1990年末，近十年內單行本著作共出版了二十二種，約四百餘萬言，即相當於我從事寫作前近似十年的書籍出版數量。……至於近年發表於海內外諸報刊的散稿，更不計其數，我至今仍每月固定向海外發稿萬餘言。臺灣歷年來亦經常翻印出版我早年著作；日本東京二玄堂邀我撰寫〈吳昌碩和沈石友的友誼〉長文，並譯成日文，為中日文化交流，作些小小貢獻。我的《藝林散葉》著作，也將譯成日文，在日本出版。至於香港、美國、日本各地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，出版各類書籍，時時也都摘引我的許多著作中內容。」

鄭逸梅的作品，概括一個字是「雜」，而這「雜」字絕非指其雜亂無章，而是說其談論的範圍之「廣」。因為舉凡金石書畫、版本目錄、雕刻塑像、詩文辭翰、技工巧匠、才媛名流、戲劇電影、醫藥氣功、飲食烹飪、名勝古蹟、花木禽魚等等，他都可以娓娓道來。學者陳子善在〈人淡似菊品逸於梅〉文中曾指出：「鄭老的補白多則數百言，少則十餘字，文字精煉，耐人玩索，吉光片羽，足資啓迪。他寫人物，只描畫其一眉一目，一笑一顰；記事件只擇其涉筆成趣的精彩部分加以渲染；抒情懷，也是含蓄濃縮，以格言點綴其間。如最短的一條『許地山擅彈琵琶』，寥寥七字，就把許地山鮮為人知的特長和盤托出。這種『補白』被論者稱之為『鄭公體』，即繼承了六朝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和清代張潮《幽夢影》的傳統，又有鄭老自己的創造和風格，推陳出新。」因此早在二〇年代，由於他作品的知識性、趣味性強，雅俗共賞，就深得廣大讀者喜愛而蜚聲文壇了。而他最喜歡的是寫人物掌故。他在自己的選集引言中說：「所述以人物掌故為歸，這是我始終一貫的作風，而以『舊聞記者』自號。」當時還有一個喜寫人物掌故的陸丹林，名聲也很大。因此南社詩人陳仲陶有「掌故羅胸得幾人？並時鄭陸兩嶙峋」的詩句。

鄭逸梅掌握的材料似乎用之不盡，寫之不竭，對此，他說：「我所有資料，大致來自兩個方面，……一是書本，我喜歡剪報，平時做些索引，……我具備的各類書籍較多，因之也不必向圖書館去借閱，但這些尚屬死資料。二是活資料，我過去經常拜訪一些德高望重的耆宿，他們都是淵博廣洽，且又經歷了不少時代，一肚皮的文史掌故，樽酒談笑之間，充實我的見聞，我則頗如聚斂者錙銖拮拾，得了不少豐富的活資料，先草草記些片段，謄於手冊上，有了這樣



一個概況，今後看了就可憶及，我認為稗官小說，十之有九是空中樓閣，不如筆記較為可靠，因之我搜羅各種筆記，比稗官小說，多若干倍。再以書本所載相互配合，以古證今，以今考古，兩相融合，……」鄭逸梅藏書極多，他在文革抄家時，將彼「畢生所藏書畫文物，悉數滿載七車駛出弄外」。而到了晚年，在他十一、二平方米的斗室裡，櫥裡架上、床底、屋角，到處都堆滿了書，他把它比做「陸放翁的書巢」，戲稱為「書堆一地，斯文掃地」。鄭逸梅生平以讀書為樂，他說：「不論春之朝、秋之夕、酒之後、茶之餘，或雨晦風瀟，或日煦景淑，都是讀書的好時光，讀未見的書，如得良友；見已讀的書，如逢故人。」如此廣泛的閱讀，讓他腹笥極豐。加以他喜歡集藏名人尺牘，認為信札可以積小見大，舉凡政治經濟、社會現象，積累起來，便是珍貴的史料，尤其是一些名人，他們所接觸到的，更不同一般。有些官書上認為忌諱，不直登載的，卻在信札上可以找到一鱗半爪，作為追探史實的線索；即使是談論一事一物，似無關宏旨，但當時的習俗風尚，物價市面，也可作今昔的對照；而且信札限二人之間，不會板起面孔說話，更顯真實。正是因為如此，鄭逸梅掌握了這些優勢，得天獨厚，使他在文史掌故方面的成就，別人難以企及。

鄭逸梅的著作中，影響較大的有《南社叢談》、《清娛漫筆》、《藝壇百影》、《文苑花架》、《藝林散葉》、《書報畫舊》、《上海舊話》、《掌故小札》、《清末民初文壇軼事》、《藝林拾趣》、《藝苑瑣聞》、《藝海一勺》等。這其中有兩部著作：《南社叢談》和《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》是具有史料性的完整專著。

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柳亞子、陳去病、高天梅等發起的進步文學團體，1909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成立。據說，當時曾有人先後推薦柳亞子、胡寄塵編寫南社史，他們都因為頭緒多，難度大，不肯承擔。到了八〇年代，南社社員已是寥若晨星，因此由鄭逸梅來撰寫《南社叢談》，也便成為義不容辭的了。鄭逸梅是南社成員，儘管在那時，他是叨陪末座，但畢竟因此認識了不少前輩，並能直接接觸，寫出的見聞都是第一手材料，自然格外生動真實。鄭逸梅在該書前言說：「錯綜複雜的南社，要把它來龍去脈系統地敘述一下，作為一部史料，那是很不簡單的……。可是忝居社末的筆者，卻深恐這樣因循下去，日子愈久，也就更難著筆，以後的革命青少年，對於南社的革命往跡，有如煙雲縹緲，不可捉摸。想到這兒，就大著膽把所見的，所聞的，和平時所摘錄的零星史料，一股腦兒貫串起來，試寫這部《南社叢談》。」《南社叢談》將南社的醞釀、成立、糾紛、鬥爭以及後期活動、紀念會各篇敘述外，列有〈南社大事記〉、《南社叢刊》的內容、南社社友事略、南社詩選簡注，末後〈附錄〉、〈南社社友姓氏錄〉、〈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〉、〈南社社友齋名表〉等。不但彙集了大量南社的原始資料，而且提供了很多人物和事蹟，如〈南社社友事略〉，寫了南社社友175人的傳略，其中頗有鮮為人知的事蹟。學者芮和師說：「《叢談》雖說是『資料』，但不是一般材料的編集和排比，而是在娓娓談說中隨時援引社員的詩文，組織的宣言、章程條例，以及有關文獻和回憶文

章。這些材料被串聯起來，也活了起來，成為《叢談》的重要成分，但不是《叢談》的全部。《叢談》有根有據，再加上隨時穿插的和專章撰寫的遺文軼事，就更具有鄭著所特有的風格韻味。」學者湯志鈞也說：「《南社叢談》還有《南社詩選簡述》，搜集了南社詩人一百餘位的詩詞，其中不乏知名人士，也有一些佚詩，他一一作注，功力很深，對研究近代文學史的讀者提供了方便。《南社叢談》可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一本很好的參考書，不可因其『叢談』而忽之。」

《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》是鄭逸梅應魏紹昌編輯《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》之約而寫的，作為該《研究資料》的一部分。香港的匯文閣書店曾將《叢話》抽出單印問世。鄭逸梅在該書〈弁言〉中說：「過去從未有人做過提要鉤玄的工作，如今由我擔任這個不輕易的任務，也沒有辦法可以普遍的作出系統的介紹，只能重點的抓住幾種刊物多談一些，其餘簡略一些。」又說：「雜誌部分所搜集的材料，從辛亥革命前夕直至全國解放前，較為完備，而大報副刊和小報兩部分的材料，則僅搜集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止。因為舊派文藝期刊在抗戰前已日趨衰落，這以後更是強弩之末，成為迴光返照了，出版的雜誌已遠遠不如過去的旺盛，而大報副刊的地盤也消失殆盡，小說更墮落為赤裸裸的『黃色新聞』，所以這段期間的大報副刊和小報兩部分材料，只得付諸闕如。」《叢話》計收雜誌114種，從《小說時報》、《小說月報》、《小說叢報》以至《禮拜六》、《紅玫瑰》、《紫羅蘭》、《萬象》、《永安月刊》等等。大報副刊4種：《申報》的「自由談」、「春秋」；《新聞報》的「快活林」（後改名「新園林」）；《時報》的「滑稽餘談」、「餘興」、「小時報」；和《民權報副刊》。小報45種。其中對創辦發行的起迄年月，編者作者，主要作品以至刊物的開本規模、封面插圖，都有介紹。是研究民國舊派文藝期刊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鄭逸梅也寫過小說。1921年出版的《玉霄雙劍記》，是長篇武俠小說，共出兩集。書中寫一個玉虛山人，年輕中舉，而鄙棄功名，得異僧傳授，學成劍仙。一百多歲時，收大家閨秀祝繹霄為徒。繹霄知書達禮而窈窕姝麗，功成之後，師徒雲遊四海，懲惡除奸。書名「玉霄」，「玉」就是「玉虛」，「霄」即「繹霄」。學者芮和師認為《雙劍記》在寫武功方面，在武俠小說中並無什麼突破，但對世態人情刻畫得相當生動，寫地理名勝也如數家珍，作者的知識面是相當寬廣的。魏紹昌因此也把鄭逸梅列為鴛鴦蝴蝶派作家之一（有「五虎將」及「十八羅漢」之稱，鄭逸梅名列「十八羅漢」。）對此，鄭逸梅之子鄭汝德曾代父「鳴冤」云：「他一生所寫，都為文史掌故作品，由於他生長在清末民初時代，那時言情小說風行一時，後被稱為『鴛鴦蝴蝶派』，而他從來沒有寫過才子佳人、卿卿我我的小說，因生在這個時代，被有些人也列為該派，其實是冤枉的。」談起「鴛鴦蝴蝶派」當年被「新文學」批過、罵過、奚落過，也因此不僅鄭逸梅，連包天笑、周瘦鵑、范煙橋以及其他名家都否認自己是鴛鴦蝴蝶派，任誰也不願戴上這頂「不光彩」的帽子。范煙橋、鄭逸梅在為魏紹昌的《鴛鴦蝴蝶派研究資



料》編寫文稿時，就分別要求冠以《民國舊派小說史略》及《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》，以「民國舊派」來取代「鴛鴦蝴蝶派」的稱謂，可說是「有意避諱」。

鄭逸梅在《近代名人叢話》前言中說：「我生於上個世紀，經過清代、辛亥革命、洪憲稱帝、張勳復辟、軍閥混戰、民國時代、抗日戰爭，直至新中國成立，以往所見所聞，歷歷在目，這許多，在中青年是不易知道的，我應當把它記述出來，告訴後人，否則隨著老人逐一故世，這許多歷史掌故，實也因此而泯滅，豈不可惜。乘此秉燭餘明，頭腦尚不遲鈍，留些祖國精神遺產給下一代，這就是我晚年寫作的目的。」正是緣於此，鄭逸梅能夠在只有八平方米的臥室兼書齋「紙帳銅瓶室」一住四十多年，直到生命的最後，而數百萬字的著作都是在這裏誕生的。他的離世，對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，是個莫大的損失，正如學者陳子善在悼文中說：「……鄭老謝世，使本世紀有影響力的舊派文人全部隱入歷史，今後不大可能再產生像鄭老這樣的文史掌故大家了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它標誌著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……」。📖

延伸閱讀

- 鄭逸梅（2006）。南社叢談：歷史與人物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鄭逸梅（1991-2001）。鄭逸梅選集。哈爾濱市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。

